

中亚经济 30 年：从转型到发展

李中海

【内容提要】 中亚国家独立后经历了从寻求经济转型到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进入 21 世纪,转型叙事逐渐淡出中亚国家经济研究视野,但多数国家的经济改革进程仍在继续。经过 30 年发展,中亚各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各国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转型、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悖论。在中亚五国中,资源型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劳务输出型国家的经济较为困难;自由化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不能令人满意;各国经济呈现明显的资源依赖型特征。中亚国家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就要在强有力的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市场经济选择,改善治理质量,继续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对外部世界敞开大门,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关键词】 中亚经济 经济转型 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 李中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执行主编。

中亚国家独立 30 年,是一个回顾、分析和解释其发展历程的契机,也是反思中亚问题研究的契机。本文之所以用“从转型到发展”作为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是独立 30 年来,中亚经济走过了从寻求转型到谋求发展的历程,各国从苏联时期的地方行政区转变成为独立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必然首先要解决经济体制转型问题,回避转型问题无以解释今天中亚经济的制度基础;二是在中亚国家独立 30 年后的今天,对中亚经济的研究应从转型范式转向发展范式,即不再从转型角度而是从发展角度来分析和研究中亚经济,不如此就无以解释中亚经济的现状和未来。

需要明确的是,中亚经济转型与发展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进行的,中亚国家独立 30 年是在政治上巩固国家独立地位、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是

在外交上维护新生国家利益、寻求获得外部支持以发展壮大过程，也是在经济上基于其经济现实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对中亚经济 30 年的研究离不开这样的特殊背景和特殊现实。正如赫拉·明特所说：“研究落后国家比研究发达国家更需要通过传统的社会表述的帷幕，深入到它的需要、活动和环境的相互适应的真正过程中去……不从主体方面考虑落后地区人的基本问题，单纯构想经济的宏观模式是很危险的。”^①

同时，由于中亚国家脱胎于苏联时期的地方行政区，其经济曾是苏联统一国民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独立后的中亚经济必然带有过去时代的深刻烙印。这种烙印对中亚经济的影响体现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方面在于苏联时期近 70 年的建设为中亚国家创造了发展民族经济的基础条件，使其摆脱了此前比较落后的部落政治、部落文化和自然经济，初步形成具有现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消极方面在于中亚地区由于承担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地区分工，且这种分工完全基于当地的资源优势，使得中亚多数国家无法形成完整的经济体系，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经济布局造成这一地区不同经济领域和部门畸轻畸重，使得今天中亚多数国家的经济难以均衡发展。

研究中亚经济经常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亚国家虽然看似处在具有同一性的地理空间内，但各国之间“两两相似，个个不同”，各国在经济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生态环境、社会服务质量和基础设施保障等所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经济上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而非同一性，很难用同一的标准和尺度对这一地区的经济状况作出一般性概括^②。这一地区既有以油气资源为基础的资源型经济，如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有依靠劳动力输出赚取外汇收入的劳务输出型经济，如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制造业、农业和能源产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如乌兹别克斯坦。同时，在这一地区，既有低收入国家，如塔吉克斯坦，也有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将如此多样的经济体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进行分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本文试图以转型、增长和发展为线索，对 30 年来中亚经济体制变化、绩效表现和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揭示和解释转型经济体发展的特殊性和选择发展道路的复杂性。

^① [英]赫拉·明特：《经济落后的解释》，《牛津经济论文》（1954 年 1 月），第 149 页。转引自[美]吉拉德·M.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编，刘鹤等译：《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 页。

^② Артём Данков.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s://russiancouncil.ru/postsoviet2020-centralasia-socecon>

一 转型叙事已经淡出,经济改革仍在继续

转型是苏联解体初期中亚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涉及各国经济乃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核心问题,转型理论及其对转型的指导意义一度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①。但世易时移,在30年后的今天,转型叙事已淡出中亚经济研究的视野,虽然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仍在继续,但转型一词已经逐渐消失,这意味着中亚地区的大规模制度变革已经结束,开始转向具体领域的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

(一) 转型初期中亚国家经济转型的基本特点

中亚各国初始阶段的经济转型呈现各自不同的图景和特色。塔吉克斯坦在独立初期爆发内战,土库曼斯坦并未表现出明确的转型意愿,即便有较强转型动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其转型之路也存在巨大而鲜明的差异。吉尔吉斯斯坦提出了激进化的转型模式,乌兹别克斯坦选择了渐进化转型策略,萨哈克斯坦的转型则更加折中稳健。如果各国官方统计数据无误,可以明显看到,哈乌两国在经历转型初期的混乱和衰退后,很快就实现了经济增长,1996年两国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分别增长0.5%和1.7%,此后乌兹别克斯坦GDP一直维持稳定持续增长态势,哈萨克斯坦则呈现忽高忽低的起伏状态。这说明两国经济结构的差异对GDP产生了明显影响,哈萨克斯坦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对国际能源价格形成严重依赖,国际油价的乍起乍落都使哈经济产生起伏。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其经济更具稳定性。通过对中亚转型进行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中亚转型初期有四个特点。

第一,经济转型方向具有不确定性。在中亚主要国家最高领导人权力过渡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其转型方向可能发生新的变化。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是高度个人化的权力模式,最高领导人的价值取向、政治主张直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随着新政治精英的崛起和国内议程的变化,新的领导人

^① 杨恕:《转型的中亚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宁:《中亚能源与大国博弈》,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杨进:《贫困与国家转型——基于中亚五国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王海燕:《新地缘经济:中国与中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杨恕主编:《聚焦中亚:中亚国家的转型及其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孙壮志:《中亚国家的跨境合作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李淑云:《中亚转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李中海:《曲折的历程(中亚卷)》,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可能提出新的转型内容和方向。

第二,中亚各国转型动力和模式存在差异。中亚各国转型有共性也有特性,各国形成了彼此差异较大的转型模式。从转型实践看,中亚国家第一阶段的转型主要由外部力量推动。进入 21 世纪,外部力量对中亚转型的影响开始减弱,各国转型模式的差异进一步加大。

第三,中亚多数国家的转型具有表面性。中亚国家的转型大多注重制度模仿,改革的深度不够(见表 1)。维持国家独立地位、开国总统执政地位的稳固性和政治社会局势的稳定性是中亚国家政治精英的首要考虑。与此相比,经济市场化是次要议题。

表 1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中亚国家 2000 年和 2010 年经济转型的评价

指标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大私有化	3.0	3.0	3.0	3.7	2.3	2.3	1.7	1.0	2.7	2.7
小私有化	4.0	4.0	4.0	4.0	3.3	4.0	2.0	2.3	3.0	3.3
企业结构重组	2.0	2.0	2.0	2.0	1.7	2.0	1.0	1.0	1.7	1.7
价格自由化	4.0	4.0	4.3	4.3	3.7	4.0	2.7	2.7	2.7	2.7
贸易和 外汇体系	3.3	3.7	4.3	4.3	3.3	3.3	1.0	2.0	1.0	2.0
竞争政策	2.0	2.0	2.2	2.0	2.0	1.7	1.0	1.0	2.0	1.7
银行业改革与 利率自由化	2.3	2.7	2.0	2.3	1.0	2.3	1.0	1.0	1.7	1.7
证券市场 与非银行 金融机构	2.3	2.7	2.0	2.0	1.0	1.0	1.0	1.0	2.0	2.0
基础 设施改革	2.0	2.7	1.3	1.7	1.0	1.7	1.0	1.0	1.3	1.7

资料来源:EBRD, Transition Report, 2011, <https://www.ebrd.com/publications/transition-report-archive>

注:转型指标分值越高,改革力度越大。1991 年各指标的初始分值均为 1,即为“无改革”。

第四,中亚国家转型存在断续性。中亚各国内外政策受国际政治格局、国内政治社会局势变化的影响较大,转型进程没有连贯性,呈现断断续续的特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国内政治

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其转型进程和重点就会随之调整。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体制转型后,各国对转型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200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一篇题为《转型经济国家:进步与前景》的报告,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进行了阶段性的回顾和评估。报告指出,到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转型国家的转型进展不一,有些国家的转型已接近终点,如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正在叩响进入欧盟的大门,有些国家的转型已行至半途,还有一些国家的转型卡在了某些关键领域,陷入停滞,有些国家的转型却刚刚起步。报告指出独联体国家转型进展极不均衡,转型前景不明朗^①。由此可见,转型进展不一,转型进程极不均衡是中亚国家经济转型的突出特点。

(二)对转型方向的认识发生转变

20世纪90年代末,转型国家经济并未随着市场化转型而好转,民众对市场化转型的态度越来越反感,在此背景下,国际经济学界对转型问题的理论认识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正如丹麦转型经济学家奥勒·诺格德在其著作《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中所说,经济制度的变革是以一整套经济观念为基础的^②。观念的变化导致制度变革速度放缓。21世纪初国际经济学界开始对转型问题进行反思,改革初期对经济转型具有指导作用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华盛顿共识”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也是坚持自由市场信念并且旨在削弱政府的作用甚至使其最小化的一系列政策。

“华盛顿共识”遭遇挫折后,作为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 E. 斯蒂格利茨提出所谓“后华盛顿共识”,其核心思想是:仅仅局限在“华盛顿共识”框架内的政策不会产生成功的发展战略;“一刀切”的政策注定会失败;各个国家可以自己实验,自己判断,去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③。“后华盛顿共识”确认市场不是万能的,因此主张采取政策同时完善市场与政府职能,更明确宣称“华盛顿共识”并不是转型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任何发展模式都必须与本国国情相适应。1999年斯蒂格利茨参加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时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表示怀疑,强调指出,“一些遵循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仍在期待着增长,而其他忽

^① IMF, Transition Economies: An IMF Perspective 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ovember 3, 2000,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exr/ib/2000/110300.htm>

^② [丹]奥勒·诺格德著,孙友晋等译:《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③ 张培刚、张建华:《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4页。

视这些模式的国家则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持续增长率”^①。

1998 年“圣地亚哥共识”的推出进一步确认了转型的新方向。这一年美洲峰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在会议上,与会各方基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国家作用持更积极的态度,提出了新的共识,即“圣地亚哥共识”,其核心思想是:发展必须基于市场,但同时市场也会失灵;一般而言,政府不应直接介入企业生产;政府在宏观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出口激励等方面具有广泛而富综合性的作用^②。“圣地亚哥共识”同时提出,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

从斯蒂格利茨提出“后华盛顿共识”到“圣地亚哥共识”推出,这标志着国际经济学界对发展问题有了新看法,其核心是对“国家在经济中应扮演何种角色”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新变化,开始从浪漫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回归现实,承认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应发挥特殊作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进一步退潮,人们的思想观念再次发生变化。正如哈恩所指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和接踵而至的大衰退以后,我们从未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自由市场需要被规范以防失控”^③。在 2009 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更加明确地指出,“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④。

(三) 转型评价尺度发生新变化

随着经济学界对转型理论出现新认识,转型评价尺度也发生了新变化。2013 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布的题为《转型进程:止步于半途?》的报告指出,2005 年前后,转型经济国家的改革已经停顿,一些国家的一些部门甚至发生了逆转。2017 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转型”(transition)概念进行了回顾和讨论,根据其成员国的结构性改革进程及出现的问题,重新解释转型概念,对

^① Joseph Stiglitz, Whither Reform? Ten Years of the Transition. Keynote Address,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 C. : The World Bank, 1999), p. 1.

^② [美]迈克尔·P.托达罗、斯蒂芬·C.史密斯,聂巧平等译:《发展经济学》,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48 页。

^③ [英]彼得·德·哈恩,于东生等译:《从凯恩斯到皮凯蒂——20 世纪的经济学巨变》,新华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2 页。

^④ 《英前首相布朗:要摒弃“华盛顿共识”等三种管理世界的途径》, <https://international.caixin.com/2020-11-21/101630900.html>

过去采用的转型评估框架进行了反思。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认识到,自转型进程开始以来,各界对国家和私营部门作用的想法不断发展。初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国家的经济作用应仅限于处理某些问题(例如自然垄断、提供公共物品、收入再分配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其余大部分事务应留给私营部门处理。按照这种方法,从指令性经济中摆脱出来的转型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应将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受约束的市场和不严格的监管会导致不良结果,例如不平等加剧、生产率下降等。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增长,特别是高失业率和实际收入增长疲软,在某些国家加剧了公众对市场的幻灭感,并减少了公众对市场改革的支持^①。鉴于上述情况,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开始改用更简单的六项指标来评估转型进程和绩效,这六项指标分别是:经济的竞争性、治理质量、绿色发展、包容性、可持续性和一体化程度(见表 2)。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同时强调,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世界上并不存在“标准的”市场经济之类的东西,也不存在通向市场经济的单一道路^②。

表 2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按可持续市场经济转型标准
对中亚国家 2018 年和 2019 年转型的评价

国别	经济的竞争性		治理质量		绿色发展		包容性		可持续性		一体化程度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哈萨克斯坦	5.22	5.26	5.62	5.67	5.11	5.36	6.43	6.46	6.17	5.95	4.96	4.91
吉尔吉斯斯坦	3.90	4.04	4.11	4.12	4.48	4.48	4.62	4.62	5.08	5.12	4.90	4.92
塔吉克斯坦	3.26	3.25	3.70	3.63	4.81	4.84	5.04	5.05	3.52	3.68	3.51	3.51
土库曼斯坦	2.80	2.80	2.28	2.28	4.09	4.09	5.41	5.41	3.26	3.21	3.96	3.97
乌兹别克斯坦	3.36	3.39	4.42	4.45	4.31	4.41	5.41	5.41	3.77	3.96	3.93	3.93

资料来源: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Report 2019 – 2020.

注:分数为 10 分制,分数越高,评价越高。

①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Report 2017 – 2018.

② 同①。

中亚国家的转型实践也发生了变化,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框架后都放弃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中心的自由化改革策略,转而采取以领导人偏好为基础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体制。金融危机进一步引发了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的讨论和质疑,使中亚国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照搬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模式无助于解决本国经济和社会实际问题,经济改革策略更加倾向于理性自主、适应本国经济现实和政治要求。

虽然转型叙事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中亚国家的改革仍在继续,最突出的是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的改革。2016年9月乌首任总统卡里莫夫突然离世,此前担任总理的米尔济约耶夫继任该国新一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延续卡里莫夫政策框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新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使乌国内的改革情绪占据上风,与中亚邻国改善关系的举动也令中亚地区局势为之一新。

2017年2月,米尔济约耶夫签署总统令颁布《进一步发展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战略行动》,该文件成为米氏治国理政的纲领性文件。根据这一文件,乌又分别推出《2017~2021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五大优先方向战略行动》和《进一步实施2017~2021年发展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五大优先方向战略行动的措施》。上述三份文件确定了米氏新政的五大战略方向,即完善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确保法律至上,进行司法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和自由化;重视社会领域的发展;保障安全、族际和谐和宗教宽容;实行友好互利的建设性外交政策。五大优先方向相互关联。完善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以及确保法律至上和改革司法体系不仅旨在巩固政权,也是实施其他方面措施的前提。经济发展和自由化是国家的根本,是实施其他方面措施的基础。发展社会领域体现了对民生的重视,是经济发展和自由化的归宿。保障安全、族际和谐和宗教宽容以及实施深思熟虑的、互利的和建设性的外交政策为其他方面措施的实施创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①。乌兹别克斯坦新一轮经济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汇率自由化改革。2017年9月,米尔济约耶夫签署《乌兹别克斯坦货币政策自由化首要实施细则》总统令,宣布乌货币汇率将根据市场机制确定,这一法令的出台使乌消除了存在多年的外汇黑市,理顺了货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为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乌政府的新一轮改革改善了国家形象和投资环境,其经济状况有望得到根本好转。

^① 孙钰、贾亚男、查依马达诺娃·阿依娜尔:《米尔济约耶夫的“新政”:继承与变革》,《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3期。

二 转型、增长与发展的悖论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性衰退后,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从总体看,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经济结构单一,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根本提高,尤其是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在世界经济及主要合作伙伴的经济状况发生危机时,中亚国家经济经常会受到冲击和影响。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从转型、增长和发展的关系看,转型初期各项指标越好的国家,其经济状况越不令人满意。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中亚国家的转型评价也证明了这一点:政治改革得分越高的国家,经济状况越糟糕。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同样难以实现。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和复杂得多。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因此,需要一并考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目前,关于经济发展,经济学界同样存在很大争论,尚未达成共识。彼德·T. 鲍尔认为,不存在能确保所有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一定时期内达到同一水平的经济成就或同一发展速度的通用规则。经济成就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欲望、态度,取决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安排,取决于历史经验,却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接触、市场机会以及自然资源^①。从中亚国家经济转型、增长和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可以同意鲍尔的第一句话,即不存在经济发展的通用规则,但他的第二句话在中亚地区不能得到证实。中亚国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资源优势和对外贸易。同时,中亚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各不相同,经济增长速度与政治经济改革之间存在悖论。经济绩效与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与资源禀赋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自然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当然,在未对经济增长的所有因素进行彻底分析且未对各国转型进行比较的情况下,否定政治转型的价值同样是冒失的。中东欧一些国家的转型证明,政治转型有利于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从中亚国家独立30年以来的经济数据看,各国经济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从整个地区来看,按现行价格计算,1990~2019年,中亚地区GDP

^① [美]詹姆斯·A. 道、史迪夫·H. 汉科,[英]阿兰·A. 瓦尔特斯编著,黄祖辉、蒋文华译:《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0页。

总额从 559 亿美元增至 3 047 亿美元,增长近 6 倍;按不变价格计算,增至 1 393 亿美元,增长 2.5 倍。按现行价格计算,人均 GDP 从 1 115 美元增至 4 161 美元,增长 4 倍多。但是各国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存在明显差异。两个贫穷国家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表现略逊于其他国家。按现行价格计算,30 年间,吉尔吉斯斯坦 GDP 增长 58 亿美元,2019 年 GDP 总额为 85 亿美元,年均增长 4.1%;人均 GDP 增长 722 美元,2019 年人均 GDP 为 1 318 美元,年均增长 2.8%。塔吉克斯坦 GDP 增长 55 亿美元,2019 年 GDP 总额为 83 亿美元,年均增长 3.8%;人均 GDP 增长 357 美元,2019 年人均 GDP 为 894 美元,年均增长 1.8%。两个资源型国家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速度较快。30 年间,土库曼斯坦 GDP 增长 452 亿美元,2019 年 GDP 总额为 483 亿美元,年均增长 10%;人均 GDP 增长 7 290 美元,2019 年人均 GDP 为 8 124 美元,年均增长 8.2%。哈萨克斯坦 GDP 增长 1 520 亿美元,2019 年 GDP 总额为 1 817 亿美元,年均增长 6.4%;人均 GDP 增长 7 982 美元,2019 年人均 GDP 为 9 793 美元,年均增长 6%。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多样化程度较高,其总体经济表现在中亚国家中处于中游水平。30 年间,乌 GDP 增长 403 亿美元,2019 年 GDP 总额达到 579 亿美元,年均增长 4.2%;人均 GDP 增长 890 美元,2019 年人均 GDP 为 1 756 美元,年均增长 2.5%。

虽然中亚各国都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从全球范围看,这一地区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仍处于较低水平。中亚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经济占世界经济的 0.35%。从全球经济排名看,只有哈萨克斯坦排名靠前。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19 年,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全球排名分别为第 60 位、第 73 位、第 50 位和第 54 位;同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排名分别为第 144 位、第 163 位、第 158 位和第 148 位;塔吉克斯坦的排名分别为第 139 位、第 174 位、第 154 位和第 149 位;土库曼斯坦的排名分别为第 136 位、第 122 位、第 101 位和第 89 位;乌兹别克斯坦的排名分别为第 69 位、第 77 位、第 78 位和第 82 位。从人均收入看,中亚国家分别属于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世界银行将全球经济体划分为四个收入组别,分别为高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和低收入组。这些组别用于显示不同国家(地区)在减少贫困、经济增长、增加人均国民收入等措施方面的表现。人均国民总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及其在四个组别中所处位置的主要指标。2021 年四个组别人均国民收入的分类标准是:人均收入不到 1 035 美元为低收入国家;1 036 ~ 4 045 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0.404 6 万 ~ 1.253 5 万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 1.253 5 万美元为高收入国家。按照这一

标准,塔吉克斯坦人均收入为1 010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人均收入为2 020美元,吉尔吉斯斯坦人均收入为1 220美元,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人均收入分别为9 793美元和8 124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①。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亚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和经济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从经济总量看,哈萨克斯坦超过其余四国的总和。如果官方数据无误的话,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人均GDP规模也与哈萨克斯坦相差不大,而吉、塔、乌三国的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哈乌两国GDP差距较独立初期明显拉大,说明乌兹别克斯坦相对封闭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滞后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消极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则较为特殊,吉资源状况和经济基础与哈乌两国相去甚远,独立后形成的贫富分化和地区差异加剧了社会不满情绪,导致吉在独立后30年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政治混乱,最高领导人和政府多次意外更迭,虽然被称为“民主之岛”和“转型的优等生”,但民众并未从转型中获得实惠,国家经济也一直处在危机边缘。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直观地看,可以得出以下三条浅显结论。首先,油气资源富集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油气生产和出口大国,在国际油价高涨时期,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最快。其次,政局稳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国家。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陷入近7年的内战之中,直到1997年才恢复和平,吉尔吉斯斯坦则发生了三次“革命”,社会和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这两个国家的GDP规模和增长速度处于较低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中亚各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经济结构与转型前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关于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的措施是创造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建立足够数量的机构,自由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存在。但是任何改革都是在特定时空边界内进行的,如果不考虑措施的时序和地域特点,任何时髦的精确设计都无法落到实处,即便得到落实,其效果也可能与原初的设想大相径庭。因此,要实现转型和改革的初衷,就必须找到适当的改革速度和顺序,需要对特定空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初始条件和特点有准确的把握。

更深入研究可以发现,中亚国家经济转型与转型绩效之间存在明显悖

^① 吉、塔、乌三国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 <http://www.worldbank.org>; 哈土两国为2019年数据, <https://be5.biz/makroekonomika/profile/kz.html>, <https://be5.biz/makroekonomika/profile/tm.html>

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主流发展经济学基于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统制经济的观察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自由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提出国家退出经济的政策主张。2013 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布的转型报告提出,长期预测证明,转型国家如果不能推进改革,其生活水平就仍将落后于发达国家,或者要接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速度将会非常缓慢。从中亚五国转型样本看,需要辩证看待经济绩效与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在中亚国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民主制度和市场制度并未形成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乌兹别克斯坦并未吸收西方国家提出的政策建议,却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一度增长较快,因此也有经济学家指出,经济转型初始阶段乌兹别克斯坦的产出记录被认为是对标准转型方式的挑战^①。但是,就此得出国家控制越强经济表现越好的结论同样不符合中亚国家实际。从统计数据看,一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民众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因此,有必要对中亚各国经济分别进行考察。

三 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劣势

中亚各国在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对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按照这一地区五个国家经济的不同特点,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资源型经济,主要是指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二是劳务输出型经济,是指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是多样型经济,这里指乌兹别克斯坦。需要解释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同样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并且是中亚人口第一大国,这个国家既输出天然气,也输出劳动力,但是乌经济并不单纯依赖于其中任何一种资源,任何一个产业和部门对 GDP 的贡献率都不超过 20%,因此,其经济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点。

(一) 资源型经济

所谓资源型经济,一般被定义为自然资源产出占 GDP 10% 以上、占出口 40% 以上的经济^②。自然资源的经济意义是经济研究的重要问题,学术界对资源型经济发展问题存在许多不同观点。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人

^① Stanley Fisher and Ratna Sahay,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After Ten Years*, IMF Working Paper WP/00/30, February, Washington, D. C. :IMF, 2000.

^② OECD, *How to Sustain Growth in a Resource Based Economy? The Main Concept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Russian Case*, <http://www.oecd.org>

们普遍认为在某些重要资源的可得性与将来对它们的需求之间存在某种不平衡,由此曾产生资源稀缺的悲观论者,他们认为,资源稀缺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主要矿产储量的衰竭可能导致社会在21世纪早期完全崩溃。与此相对应的乐观派认为,矿产资源由于其稀缺性必然导致价格上涨,随着报酬递减,生产成本增加,在现有价格水平上生产者会减少供给,直到恢复供求均衡。资源用户在高价格时代会转向较为便宜的替代产品,或采取节约措施,减少需求。总体来说,资源枯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始终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但相对于资源储量丰裕的国家来说,过度发展和依赖于资源型产业同样存在弊端。

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油气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有人曾将中亚国家描述为仅次于中东和俄罗斯的能源宝库^①。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市场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这些国家也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高油价背景下,他们放慢了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改革步伐,表现出资源型经济的两面性。从理论上说,这种经济结构在能源价格高涨时能获得较强的发展优势,资源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出口增长,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出口收入的增长还可带动国内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刺激进口,不仅可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也可通过更多购买投资品加快非资源型企业的发展,从而使资源开采和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都希望通过发展能源工业振兴本国经济。油气工业是哈萨克斯坦经济的支柱产业。哈萨克斯坦共发现油气田208座,其中一半是油田,1/3是油气混合型的油气田,其余为天然气或凝析气田。目前进行工业开发的油气田共70座。石油开采量是消费量的两倍。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占其外汇收入的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②。包括油气开采在内的原材料采掘业是其经济发展的基础,尚无任何一个部门可以取代能源对哈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作用^③。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储量丰富,占世界天然气总储量的2%,可采储量和开采量在独联体国家仅次于俄罗斯,居第2位。土库曼斯坦目前正在开采的天然气田共127座。1994年土库曼斯坦颁布十年福利纲要,计划到2000年开采天然气1120亿立方米;2000年颁

① 中亚国家探明石油储量为150亿~310亿桶,天然气储量为230万亿~360万亿立方米,相当于全球石油储量的7.2%,天然气储量的7%;煤炭产量居世界第10位;发电量居世界第19位;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黄金的储量丰富。

② 王海燕:《新地缘经济:中国与中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

③ 张宁:《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布《2010年前土库曼斯坦社会经济改革战略》,提出能源行业将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强调要吸引外资和技术,为优先开发里海大陆架和阿姆河流域的新气田创造更有利的条件^①。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储量相对丰富,石油储量不大。目前正在进行生产作业的天然气田共 52 座,其中 12 座气田的产量超过总产量的 95%^②。

资源型经济的弱点是经济增长潜力相对较小,其原因有二:一是自然资源储量有限;二是自然资源开采的技术含量低,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有限。资源型经济的主要风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价格风险,资源出口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价格涨落的可预测性差,如国际市场价格骤降,可能引起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二是汇率风险,资源出口创汇大量流入国内,导致本币升值,对制造业产品出口有抑制作用,刺激进口;三是“荷兰病”风险,能源行业对资金和劳动力产生虹吸效应,制约非能源类产业的发展。

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虽然同为资源型经济体,但两者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前者对能源出口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后者。土库曼斯坦 2000 年出口额为 48 亿美元,GDP 为 49 亿美元;2010 年出口额为 172 亿美元,GDP 为 226 亿美元;2019 年出口额为 359 亿美元,GDP 为 483 亿美元。以上年份出口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97.96%、76.1% 和 74.33%。考虑到土主要出口商品为天然气,可以清楚看出,土库曼斯坦经济对能源资源出口的依赖性处于极高水平。对哈萨克斯坦来说,油气部门虽然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近年来油气部门的作用已有所下降。2000~2005 年油气工业支撑 GDP 总量的 50%,从 2006 年起非原材料行业开始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油气工业占 GDP 的 30% 左右,占预算收入的 1/3 和出口的 2/3。与此同时,油气行业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2008 年油气部门吸引外资占吸引外资总额的 70%~80%,2010~2014 年降至 50% 多。从 2010 年起,制造业和高科技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制造业规模仍然有限,占就业人口的 5% 左右,占 GDP 的 11%。从 2011 年起,制造业和高科技服务业(包括信息通信服务、金融服务和职业服务)的就业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汽车制造、化学和石化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大幅增长。

^① Ю. Нагорный. Экспортные маршруты для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газа//Деловой Казахстан. 2013. № 12.

^② 同^①。

表 3 1990 ~ 2019 年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出口占 GDP 的比重

年份	1990	2000	2010	2019
土库曼斯坦				
GDP(亿美元)	31	49	226	483
出口(亿美元)	—	48	172	359
出口/GDP(%)	—	97.96	76.10	74.33
哈萨克斯坦				
GDP(亿美元)	297	183	1 480	1 817
出口(亿美元)	23	104	655	658
出口/GDP(%)	7.74	56.83	44.26	36.21

资料来源: Экономик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1990 – 2019. <https://be5.biz/makroekonomika/profile/kz.html>; <https://be5.biz/makroekonomika/profile/tm.html>

(二) 劳务输出型经济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中典型的劳务输出型经济体。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目前世界上有 21 个国家的侨汇收入超过其 GDP 的 10%。这类国家的经济都属于侨汇经济,或可称为劳务输出型经济。2018 年排在世界前三位的劳务输出型经济体分别是汤加、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侨汇收入与其 GDP 之比分别为 35.2%、33.6% 和 31%。2018 年吉塔两国外流人口分别占本国人口的 17% 和 12%。

劳务输出型经济与劳务输出国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务接收国的劳动力需求和经济密切相关。大量劳动力外流说明当地劳动力市场无法保证相应数量的工作岗位,而国外则存在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独立后,“去工业化”问题严重,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失业率增加,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增加,迫使年轻人到俄罗斯或哈萨克斯坦去寻找就业机会。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口增长过快,这对其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起,这些国家就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农业成为吸收劳动力的主要部门。20 世纪 90 年代,农业投资减少,农业领域就业形势严峻,但政府无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因此就业压力问题非常突出。

塔吉克斯坦适龄劳动人口较多,据 2013 年统计数据,塔 800 万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为 219 万。由于国内就业面狭窄,塔吉克斯坦许多人在国外从事劳务,主要是做小生意和从事体力劳动。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塔吉克斯坦

约有 100 万人在国外务工,其中 98% 在俄罗斯,全年境外汇回劳务收入 41.54 亿美元(不包括随身携带),占塔 GDP 的 48.8%。根据塔吉克斯坦官方发布的数据,2019 年塔从俄收到汇款 27 亿美元,另外还有同等数额的现金由务工者随身带回国内。塔 70% 左右的家庭依靠侨汇生活。

吉尔吉斯斯坦出国务工者同样人数众多。2000 ~ 2005 年吉外流人口数量猛增,2006 ~ 2010 年有所减少,但此后再次增加。据俄罗斯中央银行统计,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劳动力移民向吉汇款 22.1 亿美元,另外以现金形式带回吉尔吉斯斯坦的美元数额也大体相当,即吉尔吉斯斯坦从俄罗斯获得收入近 45 亿美元(见表 4)。

表 4 2000 ~ 2018 年中亚国家侨汇收入占 GDP 的比重 (%)

国别	2000 ~ 2004 年	2005 ~ 2009 年	2010 ~ 2014 年	2015 ~ 2018 年
哈萨克斯坦	0.3	0.3	0.3	0.3
吉尔吉斯斯坦	2.8	18.5	29.2	30.0
塔吉克斯坦	9.3	37.2	40.1	29.0
土库曼斯坦	—	0.2	0.1	0.0
乌兹别克斯坦	—	7.3	9.4	3.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3195/Migration-and-Remittances-in-the-Former-Soviet-Union-Countries-of-Central-Asia-and-the-South-Caucasus-What-Are-the-Long-Term-Macroeconomic-Consequences.pdf?sequence=1&isAllowed=y>

劳动力移民对劳动力流出国和输入国都存在风险和利益。劳动力移民对中亚国家经济有多重影响。一方面,中亚国家的对外移民缓解了国内的就业压力,劳动力移民向国内汇回收入,为本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资金。根据专家估计,这些国家 GDP 的 15% ~ 45% 来自于劳动力移民的侨汇。另一方面,劳动力移民均为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男性,有的还有一技之长,他们到其他国家工作,对本国来说是优质劳动力资源的流失。在不同时期,来自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劳动力移民占其本国有劳动能力人口的 40%。乌兹别克斯坦从未发布过有关劳动力移民的数据,其劳动力移民数据难以准确估计。根据间接资料,该国劳动力移民总数可能在 200 万 ~ 350 万人之间。塔吉克斯坦专家奥利莫娃认为,塔内战结束后,劳动力移民向国内的汇款对该国经济恢复曾发挥积极作用,对战后重建、克服社会经济危机作出过贡献,使国内贫困水平有所下降。20 世纪 90 年代该国人口的贫困率为 84%,到 2012 年已降至 37%。但是,对劳动力移民汇款的依赖使塔经济走进死胡同。58%

的劳动力移民从事的工作专业不对口,62%的劳动力移民在建筑工地工作,这对塔来说是人力资源的浪费。

在劳动力减少和侨汇增加的双重影响下,吉塔两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别增加了15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因此,这两个国家经济受劳务输出的影响类似于资源型国家的“荷兰病”现象^①。高油价时期,到俄罗斯的吉塔两国劳动力移民增加,吉塔侨汇增加,导致其本币升值,且汇款大部分用于进口商品^②。世界银行曾发布报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侨汇更多地进入消费领域而不是投资领域,对生产性投资很少发挥直接促进作用。

(三) 多样型经济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多样化水平高于中亚其他国家,任何产业和部门占GDP的比重都不超过20%。经济多样化有利于经济稳定。在苏联解体初期,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下降幅度就低于中亚其他国家,1997年乌GDP是1990年的90%,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相应数据为59%和62%^③。2012年乌兹别克斯坦的GDP是1989年水平的两倍,这是原苏联各国中除土库曼斯坦以外最好的指标,甚至超过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捷克,仅次于中国和越南^④。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人口总数从2000万人增至3296万人。该国经济在转型期下降幅度很小,1991~1995年下降18%;恢复速度很快,1995~2003年年均增长3%~4%,2005~2012年年均增长7%~9%。2008~2009

^① Martin Brownbridge and Sudharshan Canagarajah,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untries of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 Caucasus: What Are the Long - Term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3195/Migration-and-Remittances-in-the-Former-Soviet-Union-Countries-of-Central-Asia-and-the-South-Caucasus-What-Are-the-Long-Term-Macroeconomic-Consequences.pdf?sequence=1&isAllowed=y>

^② Igor Eromenko, Do Remittances Cause Dutch Disease in Resource Poor Countries of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Program economic Papers Series No 18,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6.

^③ Султан Акимбеков. Спящий гигант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Центр Азии. 2012. № 17 - 20. С. 30 - 52.

^④ Владимир Поп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чудо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ак Узбекистану удалось то, что не удалось ни одной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http://www.econorus.org/pdf/Popov_JNEA_2014_21\(1\).pdf](http://www.econorus.org/pdf/Popov_JNEA_2014_21(1).pdf)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其经济的影响非常微弱。

有利的贸易条件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天然气、棉花和黄金的国际市场价格高涨,2002~2010 年价格上涨 4 倍。乌兹别克斯坦主要出口商品价格上涨对其经济稳定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2004~2015 年乌继续保持较高的 GDP 增长率,按不变价格计算,GDP 增长率超过 7%。但 2017 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有所下降,2017~2019 年 GDP 增长率分别降至 4.5%、5.4% 和 5.6%。对此的解释是国际油价下降所致。2017 年以后启动的新一轮改革能否起到改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余 论

综上所述,中亚各国虽然处在具有同一性的地理空间之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历史命运,支撑其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社会因素有相似之处,但各国之间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对其 30 年经济发展历程的描述和解释存在很大困难。

总的来看,中亚国家未来经济发展还需要解决以下五方面重要问题。

一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制度,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善国家治理质量,建立廉明政府,消除腐败,为经济主体的自主经济活动提供法律保障,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中亚国家铁路网、公路网密度低且道路质量差的现状,实现路网的互联互通,使经济贸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三是要培育人力资本,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平和技术吸收能力,使其成为具有较高职业能力的劳动力。

四是增强资本积累能力,通过扩大储蓄、建设资本市场为私营企业增强融资能力创造条件。

五是在继续对外开放的同时,增强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中亚地区人口相对较少,市场狭小,单纯依靠本国资源难以发展壮大,需要借助其地理优势,吸收外部资本和技术,培育发展潜力。

对中亚国家经济 30 年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并将其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可以发现,还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萨缪尔森所提出的“国富国穷”问题,即富国为何如此富足?穷国为何如此贫穷?中亚国家在领土面积、资源潜力和人口数量等诸多方面与许多欧洲发达国家不

相上下,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却明显落后于这些国家。造成这一差距的根源自然是多方面的,正如格申克龙所指出,落后国家的发展可能在几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显示出与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倾向,上文对此已有所涉猎,但仍需进一步进行概括和归纳。

中亚国家以及世界上所有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可能都需要思考以下三方面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经济学界一直着力回答但始终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首先,要辩证看待经济转型、增长、发展与国民福利之间的关系。探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最迷人的领域所在”,但对中小型经济体来说,其经济政策应着眼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即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经济增长,同时缩小贫富差距,使不同阶层的民众都能享受经济改革、增长和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因此,实现充分就业是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是各国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其次,要辩证看待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问题。西方经济学自产生以来一直排斥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市场经济的效率已经被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现实所证明,但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的自由发展尤其是资本力量的过度膨胀同样会对经济体系和经济平稳运行造成损害。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证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经济转型、增长和发展的重要保证,转型经济需要良好的经济秩序和可预测的政策环境。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转型、增长和发展,必须扬弃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排斥国家作用的思想,对国家和市场的力量及其各自应承担的角色作出新的、合乎现实需要的论证。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完全属于自由市场经济或指令性经济,均为既有市场经济的成分又有指令经济成分的混合型经济,因此不应秉持这样那样的教条而画地为牢。

最后,要辩证看待资源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资源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资源配置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虽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资源配置理论,但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要建立起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制度,为经济主体自主配置资源创造良好条件,激励经济主体利用现有资源创造新的财富。

(责任编辑:徐向梅)